

布莱希特早期诗歌中的 中国文化元素 ——以诗集《家庭祈祷书》为例*

薛松 孙茜

摘要：布莱希特一生都与中国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虽然在其流亡时期与后期文学作品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备受关注，但在他全面深入接受中国文学哲学典籍前，其早期诗作就已与中国文化暗藏着亲缘性，而学界却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在1920年的日记中，布氏就已明确表达了与老子的“不谋而合”。本文以布氏早期诗集《家庭祈祷书》中的六首诗为例，从主题、宗旨和语言风格等多重维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读，揭示布氏早期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之处，包括白居易的文学主张与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孔子、孟子的思想智慧。布氏之所以迅速迷上中国文化，根源于这种“不谋而合”，他在流亡和后期作品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大量借用和化用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其早期文学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之上。

关键词：布莱希特；早期诗歌；中国哲学；亲缘性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博士 上海 200240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240

中图分类号：I046； 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4)03-0129-1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2BZW033)的学术成果。

一、引言：诗人布莱希特

作为20世纪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一生与中国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吸收借鉴到创造性改写，中国元素在其作品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布莱希特，也许没有第二个德语国家的作家如此重视中国和中国文化。^① 越来越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布莱希特在诗歌领域的成就并不逊于其在戏剧界的成就。德国著名布莱希特研究者雅恩·克诺普夫(Jan Knopf)在其有关布莱希特诗歌的研究中赋予了布氏诗歌与其戏剧同等重要的地位。^② 黄灿然在其布莱希特诗歌译本中认为布氏作为诗人的地位超越了其作为戏剧家的地位。^③ 布莱希特一生独创的2334首现代诗歌，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交织，绝无隐晦、极度明晰，有着极强的主题性、应景性和政治关联。有别于当时风靡文坛趋于反映社会异化和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主义诗歌，布氏开创了实用主义诗学，主张诗歌应该面向理性和生活，具有政治性和实用性，从而为现代诗歌开辟了新的道路。

论及布莱希特诗歌创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④德国资深文学评论家汉斯·马耶尔(Hans Mayer)认为，布氏的中后期诗歌“如果没有中国诗歌作为榜样，是不可想象的”。^⑤ 事实上，布氏在中学时期就已接触到中国诗歌，其1915年通过创作一首李太白小诗展现了自己对诗人李白的极大热情。^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布氏在文学创作上持续大胆借鉴加工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的思想智慧并将其化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在其接受中国文化的高潮时期，即流亡途中，布氏在艺术风格上灵活移植并传承诗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从而使其诗歌成为介于翻译、改写和再创造之间的带有典型布氏风格的独创作品，借此完成对德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批判。

① 参见顾彬：《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李雪涛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页。

② Vgl. Jan Knopf, *Brecht-Handbuch: Gedichte*, Stuttgart und Weimar: Metzler Verlag, 2001, S. 1.

③ 参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④ 布莱希特接触中国文化最初是从诗歌开始的。中学期间他阅读了德译的中国诗歌，也曾表达对李白诗作的倾慕之情。流亡期间(1933—1947年)是布氏接受中国影响的顶峰时期，他以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文译本《中国诗歌170首》(170 Chinese Poems)为蓝本，选择其中七首进行仿译和改写，并以《中国诗六首》(Sechs Chinesische Gedichte)为题将该组诗发表在莫斯科的德国流亡者杂志《发言》(Das Wort)的1938年第8期上。此外，布莱希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作品《老子在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也出自这一时期。

⑤ Hans Mayer, *Bertolt Brecht und die Traditio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5, S. 99.

⑥ Vgl. Xue Song, *Poetische Philosophie — philosophische Poetik. Die Kontinuität von Philosophie und Poesie in Brechts China-Rezeption*, München: iudicium Verlag, 2019, S. 233.

《家庭祈祷书》(*Hauspostille*)是布莱希特早期极具代表性的诗集作品,在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①该诗集出版于1927年,主要收录布氏1916—1925年创作的诗歌。这部早期代表作包含歌谣、赞歌、叙事谣曲、讽刺诗、教谕诗、哀歌、情诗等,大部分诗作具有民歌特色,有很强的音乐性和歌唱性。诗歌题材体现了诗人的政治和社会关注倾向,布氏以歌词和谣曲节奏的形式对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公共生活做出生动的反应和犀利的评论,专注于一种真正的政治诗歌而不只是修辞上的政治诗歌。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中并不常见,具有令人瞩目的原创性和颠覆性,这也是该诗集受到高度认可的关键原因,布氏也因此跻身于著名诗人行列。诗集结构体现出诗人深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翻译的《圣经》的影响,布氏不仅“讽刺性地模仿了”(parodiert)基督教传统的文本形式,而且以一种非常离经叛道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转写”。^②诗歌集借基督教的训诫书与祈祷书的外壳,挑衅、背叛基督教传统和资产阶级的道德秩序、日常秩序。^③整部诗集被分为五课(Lektion)式结构,除了正文还包括阅读指南(Anleitung)、歌谱(Gesangsnoten)和附录(Anhang)。^④

对于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这一传统课题,已有研究往往基于影响研究,聚焦于布氏和中国文化有紧密关系的流亡时期和后期(即返回东德后)创作,以及中国文化对其作品的影响。对布氏最初的诗集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Affinität)却鲜有关注,且这种亲缘性至今仍无详细的文本分析。而布氏早期诗歌作品中是否已暗藏对中国文化的亲缘性?其在思想世界与文本形式上与中国文化是否“不谋而合”?本文基于平行研究,以《家庭祈祷书》中的六首诗歌为例,对其进行富有启发性的重新审读,探究布氏早期诗歌与中国文化间的共性因素。

二、阵亡士兵和林中小鸟:反战与现实倾向

布莱希特和中国古代诗歌之间的密切关联历来引人注目。继18世纪“中国热”退潮之后,20世纪初,中国再次进入了德国艺术界的视野,中国诗歌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⑤布氏接触中国文化,最初是从诗歌开始的,中学时期他就开始

^① Vgl. Jürgen Hillesheim, *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 Einführung und Analysen sämtlicher Gedichte*,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Verlag, 2013, S. 11.

^② Heinrich Detering,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08, S. 36.

^③ 参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黄雪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iv页。

^④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Werner Hecht/Jan Knopf u. a.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 299.

^⑤ 参见李双志:《德国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的现代重构——以“诗歌中国”的发现和译介为例》,载《德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5—120页,这里第106页。

尝试借助中国文化元素创作诗歌。1918年,他曾写过一首李太白小诗以表达对
中国诗人李白的仰慕之情。流亡时期,他明确把白居易、李白和杜甫等中国诗人视
为自己的榜样。^①在众多中国诗人中,布氏尤为青睐白居易,在其翻译改写的12首中
国诗歌中,白诗就占了7首。值得注意的是,布氏在其《中国诗》(*Chinesische
Gedichte*)译诗注释中参考英文参译本前言,着重介绍了白居易的个人生平及其诗
歌特点,^②字里行间难掩对这位中国诗人的欣赏。事实上,这种浓厚兴趣并非凭空
而来,而是建立在其早期诗歌与白诗在反战主题宗旨、夸张艺术手法、社会性倾向
以及通俗语言风格方面的共通性之上。

首先,我们可以从反战主题宗旨及夸张艺术手法上看出两者的共同性。1916
年前后,战争作为布莱希特诗歌创作中的重要题材,折射出布氏青少年时期战争观
的深刻转变。一战期间,在战地医院的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加之受挚
友卡斯帕尔·内尔(Caspar Neher)前线经历^③的触动,死亡、牺牲、士兵等主题成为
其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前期鼓吹战争和对祖国的狂热逐渐被战争的悲凉
气氛所代替。布氏早期著名诗歌《死兵传奇》(*Legende vom toten Soldaten*)是德国
文学中最尖锐的反战诗之一,^④其中对好战主义、民族主义的警告至今依然发人深
省。^⑤该诗首次发表在布氏同期创作的政治剧《夜半鼓声》(*Trommeln in der
Nacht*)^⑥第四幕开场,标题名为《死兵歌谣》(*Moritat vom toten Soldaten*),^⑦后
命名为《死兵传奇》收录于《家庭祈祷书》第五课。布氏运用荒诞夸张的艺术手法讲
述了德国军国主义者为了补充兵源,在战争的第五个年头将一个士兵尸体挖出坟
墓,经军医检查,他被判定“入伍合格”(kriegsverwendungsfähig),在绅士、牧师、军
医、护士的簇拥下,在“爱国”的顺民欢呼声中,重新被送上战场、又再次阵亡的故

① Vgl. Xue Song, *Poetische Philosophie — philosophische Poetik. Die Kontinuität von Philosophie und Poesie in Brechts China-Rezeption*, S. 143.

② 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388.

③ 卡斯帕尔·内尔(Caspar Neher)是德国著名作曲家、舞台设计家,布莱希特的终生挚友。内尔于1915—1918年在前线服役,共经历了32次殊死战斗,布莱希特一直担心其生命安危,多次写信恳求朋友不惜一切地脱离前线兵役。参见雅恩·克诺普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黄河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第43页。

④ Jan Knopf, *Brecht-Handbuch: Gedichte*, S. 56.

⑤ 雅恩·克诺普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第21页。

⑥ 该剧以1919年德国工人阶级“斯巴达克起义”(Spartakusaufstand)失败的真实历史形势为背景,展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⑦ 该首歌谣在第四幕开场以《死兵歌谣》的形式出现,在附录中布莱希特将其命名为《死兵谣曲》(*Balade vom toten Soldaten*)。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I, Werner Hecht/Jan Knopf u. a.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9, S. 566.

事。普通士兵的悲惨命运构成了该诗的主要情节，诗人以此嘲笑和讽刺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冥顽不灵。诗歌中，士兵在战争中自愿选择“英勇战死”(Heldentod)，统治者却为其过早死亡感到遗憾，将其遗骸重新挖出，令阵亡的士兵再上战场，这种对现实的夸张描写却因诗人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而不显失真：

然而战争仍没有结束

皇帝不免感到遗憾

他的士兵死了：

他觉得为时过早。

.....

医生仔细检查了士兵

或者说，他的遗骸

得出结论，士兵入伍合格

他属于逃避危险。^①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1917年布氏写给返回奥格斯堡疗伤的挚友卡斯帕尔·内尔(Caspar Neher)的信中有相似的表述内容。布氏在信中劝说受伤的朋友不要再让自己被判定为“健康状况适合入伍”，不要再与那些“绝望而可笑地甩着腿的男人”为伍。^②令人称奇的是，形似的语言和故事内容同样出现在上述提及的布氏组诗《中国诗》注释里特别提到的白居易的“两篇较长的以《关于止战的思考》为题的作品”^③中。虽然白居易的反战诗^④中没有相同标题的诗歌，却有描写内容相似的《新丰折臂翁》和《缚戎人》。这两首诗的英文译本(*The old man with the broken arm* 和 *The prisoner*) 在布氏与助手伊丽莎白·豪普特曼(Elisabeth Hauptmann) 1934年的通信中被着重提及。^⑤事实上，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具有相似的荒谬情节：新丰老翁叙述自己当年为躲避征兵之祸不惜自断手臂，以致不能拉弓射箭，如愿退归故里。白居易在小序中标示“戍边功也”，公开表达反战主张，可视为其讨伐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战斗檄文，以此警醒世人“战争是导致生灵涂炭的根本原因”。

① 参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第68-69页，作者有删改。

② 雅恩·克诺普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第21页。

③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388.

④ 反战诗歌是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品牌，例如主题“戍边功”的反战之作《新丰折臂翁》、“穷则达民情也”的《缚戎人》、“刺封疆之臣也”的《西凉伎》，以及河南之乱时所作的七律都烙有明显的反战印记。参见卢英宏：《诗文双壁传千秋——白居易反战诗文简论》，载《云梦学刊》，2007年第3期，第99-103页，这里第99页。

⑤ 参见史节：《布莱希特诗歌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5-16页。

两位诗人通过描写违背常理的情节,分别从侧面和正面反映了士兵在统治者好战的政策下所承受的巨大苦难,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和反战的立场。在流亡时期,布莱希特接触的白诗恰与自己早期诗歌在主题宗旨上不谋而合,共同的反战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让布氏在流亡时期把白居易塑造成自己的“中国榜样”,即一位出身贫寒、反对战争、批判统治阶级热衷于战争并受到大众喜爱的社会批评家形象,^①这同时也为布氏积极改写白居易诗歌埋下伏笔。

依据布氏自己的回忆记录,《死兵传奇》初稿《死兵谣曲》(*Ballade vom toten Soldaten*)最早可能完成于一战期间的1917年,^②诗歌中寿衣的“黑白红”^③三色正是德意志帝国国旗的颜色,因此这首诗实则影射的是德国军国主义者滥用武力、肆意发动战争。1918年,布氏也曾在一份遗稿中提及德国恶劣的战时形势,即《死兵传奇》的创作基础:

1918年春,帝国将军鲁登道夫命令在全德国展开最后一次挨门逐户搜查。无论17岁还是50岁的男丁,都要套上军服、被送往前线。kv一词本意为健康状况“符合入伍标准”,如今,它令数百万家庭畏怯胆寒。民间传言,他们甚至要把死者从坟墓里挖出来服兵役。^④

在战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时任军务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仍如强弩之末做垂死挣扎,逼迫士兵继续为德意志沙文主义扩张卖命。统治阶层只对战争中为自身设定的目标利益感兴趣,却对士兵的个人命运漠不关心,士兵不过是他们达到目标的手段。在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中,白氏同样借助一位极具个性的形象——折臂翁,通过描述他独特的折断右臂的方式,谴责了唐玄宗对南诏国发动不义战争,导致二十万余士兵伤亡的事件。这与布莱希特诗歌通过具体个案揭示普遍问题的手法有一定的共性,两首诗歌极富表现力。

中德两首诗用反讽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将战争的虚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德国威廉帝国时期,统治阶层、军队和教会狼狈为奸,通过政治宣传鼓吹战争神圣。阵亡的士兵看似被赋予英雄头衔,实则却被推入死亡的深渊:

手持一把神圣铁锹
掘出这名死兵。

^① Vgl. Xue Song, *Poetische Philosophie — philosophische Poetik. Die Kontinuität von Philosophie und Poesie in Brechts China-Rezeption*, S. 157.

^② 布莱希特的记忆可能有误,根据诗歌内容以及他后期的记录推测,该诗创作于1918年春。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XII, Werner Hecht/Jan Knopf u. a.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3, S. 138 u. 927.

^③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114.

^④ 同上, S. 322, 作者译。

.....

在他身上晃动香炉，
使其臭味不再散扬。^①

《家庭祈祷书》中对教会的描绘具有隐喻性质。布莱希特提到了基督教的圣物“铁锹”(Spaten)和“香炉”(Weihrauchfaß),其中“香”(Weihrauch)象征忠诚的祈祷者。教会声称战场是“荣誉之地”,阵亡的士兵应该受到特别庄严和隆重的待遇,须赋予其“英雄”的称号,因此,积极参战反而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布莱希特运用荒诞夸张的手法,^②以国旗作为“裹尸布”的隐喻摧毁所谓的爱国主义神话,深刻揭露了政治谎言背后隐藏的真相——死亡。^③他认为“人民为国家而死是甜蜜而光荣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功利性宣传”,^④反对国家和社会机构对个人的占有。^⑤显而易见,布氏通过杜撰的献词纪念已在复活节前一周去世的士兵克里斯蒂安·格鲁贝斯(Christian Grumbeis)。该诗表面以宗教语境为依托,实际上对基督教的受难与复活提出了隐性质疑;诗歌标题中的“传奇”(Legende)也凝聚着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用意,该词在欧洲文学史上常用于歌颂古代英雄,尤其是宗教故事中的圣徒,^⑥但诗人此处却“正词反用”以表达对空洞爱国主义观念的颠覆,尤其是对英雄情节的批判。这种大胆想象所产生的间离效果,旨在抨击个人为国家而牺牲的煽动性宣传以及个人被集体化的现象,体现作者坚定的反战姿态与和平主义立场。这首风格阴暗的反战诗对布氏一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33年,希特勒上台成为国家元首,纳粹帝国内政部随即在1935年6月把布莱希特列入开除德国国籍的作家名单中,而且将其排在显赫的第五名。这首“辱骂”德国前线战士的“拙劣作品”(Machwerk)显然是决定性因素。^⑦布氏自己曾在一首诗《当我被迫流亡》(*Als ich ins Exil gejagt wurde*)中解读道,他被纳粹德国驱逐出境,因为他在一首诗中嘲

①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113. 作者译。

② 布莱希特在一篇以 *Weite und Vielfalt der realistischen Schreibweise* 为题的文章中表示:“当人们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现实并展示其可变性时,简单地再现现实已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篇文章收录在于1954年出版的 *Versuche 31* 中。参见 Jan Knopf (Hrsg.), *Brecht-Handbuch: Gedichte*, S. 54。

③ Jan Knopf, *Brecht-Handbuch: Gedichte*, S. 53。

④ Werner Hecht, *Bertolt Brecht.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Texten*,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8, S. 20. 这句话出自布莱希特高中时期(1915年)的一篇课堂习作。

⑤ Vgl. Jürgen Hillesheim, *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 Einführung und Analysen sämtlicher Gedichte*, S. 39。

⑥ 谭渊:《从流亡到寻求真理之路——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20-124页,这里第124页。

⑦ 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XII, Werner Hecht/Jan Knopf u. a.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3, S. 927。

笑了世界大战中的士兵。^①与布氏的创作手法相似,白居易作诗同样擅长运用反讽。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及社会功能可以将白诗分成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讽喻诗是体现兼济天下志愿、批评社会现实与时事政治的作品。^②例如,在其著名反战诗《新丰折臂翁》中,白居易以夸张和反讽的方式将“自断手臂以逃避战争”这种离经叛道的个别事例进行颠覆性解读,从而达到批判不义战争的目的。因此,无论从展现士兵主题的诗歌情节还是从荒诞夸张的表现形式上看,布氏早期诗歌作品都与白诗之间存在明显的亲缘性。

其次,相同的社会性倾向是布氏和白氏诗歌具有相通性的基础。布莱希特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倾向,《家庭祈祷书》不单是情感涂鸦或对主观感受的表达,更是在借助文学批判现实从而引人思考。^③布氏虽然在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身边却被无产者环绕,加之周围动荡不安的社会氛围,他在青年时期就接触到本阶级内的种种腐败和诸多弊端。布氏不仅在诗歌创作中从各方面去挖掘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④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艺术化,艺术政治化”^⑤二元程式写作原则,其以此文学信念构建的作品,富有启蒙性、教育性、社会性、政治性。而白居易同样出身于乱世的中小官僚家庭,相似的生命体验构成了二人文艺观相近的环境基础。白氏的讽喻诗多数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一方面抨击朝政腐败,揭露社会弊端,另一方面反映民间疾苦,同情人民遭遇。这一社会性倾向也在布氏诗集的另一首诗歌《声息颂歌》(*Liturgie vom Hauch*)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诗以1917年十月革命前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为背景,描绘了战时背景下经济和生产完全服务于军队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情景。诗人运用戏仿手法将歌德诗情画意般的《漫游者的夜歌》(*Wanderes Nachtlied*)引用到通俗的叙述诗中,意在批判在暴政中逃避现实、选择沉默的行为。歌德诗中受到歌颂的大自然的寂静与和谐,却被布氏改编成鸦雀无声的恐怖象征:

随之鸟儿们在树林里悄无声息,
树梢一片寂静
群峰之巅你几乎感觉不到
一丝声息。^⑥

① 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V, Werner Hecht/Jan Knopf u. a.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3, S. 185.

② 参见金涛声:《白居易诗传》,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版,第102页。

③ Vgl. Jan Knopf, *Brecht-Handbuch: Gedichte*, S. 150 - 151.

④ 参见雅恩·克诺普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第11页。

⑤ 参见李昌珂:《布莱希特:中国命题》,载《文艺报》,2022年4月6日,第7版。

⑥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49 - 50, 作者译。

“小鸟”被赋予了强烈的讽喻色彩，它们的沉默映射了人们对社会罪恶的沉默、对泯灭人性的沉默，布氏以此批判不公正社会秩序中麻木不仁的诗人，讽刺其脱离现实的诗意是对黑暗现实的纵容，^①展现了对资产阶级政权下社会现状的质疑。这种社会关怀和社会改良思想源于布氏“诗为人民所用”的诗学观念，与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②的纲领性创作宗旨不谋而合。白居易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③他认为，统治者为政应“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策林七·不劳而理》），即顺应民心民意，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在白氏担任谏官期间，他讽谏并举，除了给皇帝上书写奏状，还将可以解除人民痛苦、弥补朝政缺失而又不宜直言的内容写成诗歌上呈皇帝，以示其平生志愿：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与元九书》）^④

为完成“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战斗任务，白居易将文学运用于政治、社会批评中，大量创作讽喻诗，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现实政治问题、反映民生疾苦。在《白氏文集》中存录讽喻诗 172 首，包括最著名的《秦中吟》10 首和《新乐府》50 首。这些讽喻诗创造了卓著的光辉业绩，铸成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也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并遭受诸多非议。^⑤在流亡时期，布氏着重表达了对白居易令豪绅权贵“脉脉尽不悦”“相目而变色”的讽喻诗的赞赏。^⑥这类以民生社稷为主题、站在人民的视角从各个角度揭露中唐社会矛盾的政治诗歌，被布氏称为“令暴君和宠臣面面相觑、惊恐失色”^⑦的佳作。因此，从思想连贯性看，布氏日后接连改编白诗也在意料之中。

最后，从诗歌语言上看，布氏和白氏诗歌语言皆浅显易懂、言浅意深，因此诗作往往呈现出平中见奇的效果。布氏早期诗集《家庭祈祷书》极少采用晦涩难懂的字句，注重诗歌语言的可理解性和大众性，从中不难看出这一语言特征与白氏在诗歌修辞炼句方面的亲缘性。流亡时期的布氏更是极力推崇白居易把自己作品读给农家老妪听、以确认他的诗歌是否通俗易懂的创作行为，评价其诗歌“文字简约，但却

① 参见韩瑞祥：《布莱希特诗学观的最初自白——论〈声息颂歌〉》，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92-96页，这里第94-95页。

② 陈学友：《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6页。

③ 参见金涛声：《白居易诗传》，第26页。

④ 同上，第44页。

⑤ 同上，第64页。

⑥ 张黎：《异质文明的对话——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28-38页，这里第29页。

⑦ 原文参照 Versuch 第10册后的 Anmerkungen，此处为作者直译。

异常细致认真”，“常常被写在乡村学堂、寺庙和篷船墙壁上”。^①在自己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布氏更是直接吸收了白诗简约而容量大的特点，在提炼生活素材和遣词造句方面精益求精，使其诗歌既凝练精确、冷静客观，又容易为读者所理解。此外，白居易还在艺术方面领导新乐府运动，反对吟咏风花雪月和绮丽之风，这与布莱希特诉诸理性客观而非感情、^②追求形象清晰而非模糊玄妙的艺术观念相对应。布氏早期主张颠覆传统的艺术形式，^③以质朴冷漠、寓意深刻的叙述代替纵横飘逸的主体抒情，试图把诗与人、诗与社会、诗与理想和诗与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立一种全新的诗学风格，^④这种新风格使布莱希特与白居易产生了跨越时空的思维碰撞。可以说，布氏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已经在主题宗旨、语言风格和艺术观念上潜含白居易的部分诗学特征，因此，他在流亡时期和后期创造性地改写“中国诗”时首先被白诗所吸引，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三、杀婴的母亲：善恶与温饱相关

布莱希特的视野并未局限于中国传统诗歌，因此，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也是理解和阐释布氏诗歌艺术必不可少的工具。^⑤对中国先秦诸子思想的兴趣是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亲近的主要表现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布氏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接受同样建立在布氏早期文学创作和儒道思想之间的隐性关联之上，这在《家庭祈祷书》中可见一斑。

以孟子思想为例，20世纪初，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了一系列中国哲学经典，其《孟子》德译本早在1916年就在德国出版了。很明显，布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接触过孟子学说，^⑥因为他把孟子的财产道德观浓缩成1928年戏剧《三毛钱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先填饱肚子，然后再讲道德”(Erst kommt das Fressen, dann kommt die Moral),^⑦这一度引发当时青年观众的强烈共鸣，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而在此之前，与孟子相似的思想，如有关人的

①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388.

② 布莱希特为避免诗歌中直接而强烈的情感化表达，常引入无名的抒情者(der lyrische Sprecher)代替以诗歌主人公或诗人自己为主体的抒情。《家庭祈祷书》第一课中多首诗歌的副歌(Refrain)部分均采用这种艺术手法。Vgl. Jan Knopf, *Brecht-Handbuch: Gedichte*, S. 150.

③ Vgl. Jürgen Hillesheim, *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 Einführung und Analysen sämtlicher Gedichte*, S. 19.

④ 参见韩瑞祥：《布莱希特诗学观的最初自白——论〈声息颂歌〉》，第92页。

⑤ 参见张黎：《布莱希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⑥ 同上，第30页。

⑦ 同上，第191页。

生活状况、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的论述，也在布莱希特的早期作品《家庭祈祷书》中清晰可见。

孟子的财产道德观在布氏 1922 年创作的诗歌《关于杀婴犯玛丽·法拉尔》(*Von der Kindesmörderin Marie Farrar*)中已有所体现。该诗收录于《家庭祈祷书》第一课，讲述了一位少女迫于贫穷而杀死亲生孩子、最终被判死刑的故事。有研究者认为，该诗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起真实事件：据《新奥格斯堡报》(*Neue Augsburger Zeitung*)的报道，一位 27 岁的未婚女孩被指控过失杀婴，并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① 诗歌中不加修饰的公式式语言和纯客观的记述语调使其更像是一份审讯记录(Polizeibericht)：

玛丽·法拉尔，生于四月
未成年，毫无特点，佝偻病患者，孤儿。
似乎一向品行端正，她以如下方式
杀死了一个婴儿：
她说，怀孕第二个月她就跑到
一个女人的地下室
.....
她说，她还是根据约定^②
.....

布氏在首节仅用“未成年、毫无特点、佝偻病患者、孤儿”(unmündig, merkmallos, rachitisch)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主人公玛丽身世坎坷、孤苦无依的形象。全诗以法庭记录员的视角描述了玛丽蜗居在地下室的悲惨生活，包括从怀孕到堕胎失败、分娩再到杀婴的过程，同时转述了玛丽对自身罪行充满愧疚和痛苦的辩白。诗人极力还原审讯过程，频繁出现的叠句“她说”(sie sagt)引人注目，在凸显少女供述真实性的同时，增强了整首诗歌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不过，布莱希特并未将玛丽的悲剧命运归咎于个人罪责，而是将其归咎于恶劣的社会环境：玛丽不是肇事者，而是受害者。^③ 杀婴行为本身并非一场有计划的谋杀，更多的是迫于生存环境的无奈之举。玛丽身上并非没有母性光辉，只是被这黑暗残酷的现实熄灭了。杀婴犯本该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谴责，却被诗人刻意塑造成一位苦痛深重的可怜母亲：

^① Vgl. Werner Hecht, *Brecht-Chronik 1898—195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7, S. 141.

^②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第 32 页。

^③ Vgl. Hans-Thies Lehmann, *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 Text und kollektives Lesen*, Stuttgart: Metzler Verlag, 1978, S. 77.

玛丽·法拉尔：生于四月
死于迈森的监狱
法院给这个未婚母亲判了刑
以向诸位展示众生的缺陷。
你们在干净的产床上顺利分娩
并称隆起的小腹是上天的“恩典”
你们该不会谴责那些堕落的弱者
她们固然罪孽深重，但她们的苦痛也深重。
因此我请求诸位不要陷入愤怒
因为所有的造物都需要他人的帮助。^①

每一节最后反复出现的两行诗透露出作者对于这位孤立无援的年轻女人的怜悯和同情。布莱希特认为，玛丽作为不平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她的罪行来自于所受的苦难，养尊处优的上层阶级没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谴责和审判这位“有缺陷”“堕落”的母亲。诗人在整首诗里清楚地表明，人类道德的堕落是由现实社会决定的，并从下层劳动人民的角度表达了对社会环境残酷不公的愤懑，阐明只有在公平合理、没有剥削的社会环境下才能诞生道德完善的人的道理。

布氏诗歌所传达的思想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财产道德观念不谋而合。在孟子看来，只有在百姓衣食无虞的情况下，方可引导他们习礼向善；百姓若没有固定财产、衣食没有保障，就可能走上犯罪之路。社会关系失常同物质财富匮乏存在因果关系，这与诗歌《关于杀婴犯玛丽·法拉尔》的观点极为相似。在布氏看来，穷人的罪行往往有难言之隐，个人道德的堕落也受恶劣社会环境的影响。布氏倾向将善恶视为与人的温饱相关的事情，唯有温饱满足，才可以再讲道德问题。脱离人类存在的物质条件空谈道德，还要据此来改造社会、创立新的社会秩序，这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布莱希特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解剖者，试图通过诗歌启发读者识破这个冷酷无情、使善良之人无法生存的罪恶社会的本质。正是这种思想上的亲缘性，让布莱希特在几年之后接触到《孟子》译本时，在思想层面与孟子产生了高度共鸣，并将相关表述化用到自己戏剧作品《三毛钱歌剧》中，“先填饱肚子，然后再讲道德”这句经典台词浓缩了这首早期诗歌的核心思想。

四、“抵制诱惑”：诗歌作品的教育功用

布莱希特早期诗歌和孔子思想之间的亲缘性则具体表现在作品立意方面。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新客观主义风格在诗歌创作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在其影响

^①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第35-36页。

下,诗歌领域出现了实用诗(Gebrauchslyrik)。实用诗是为了某种特定用途或者目的而创作的诗歌,其内容常常反映并帮助读者认识到当下时代和社会的问题。因此,此类诗歌的语言表达相对清晰易懂,尽量避免多义性比喻和象征,贴近现实和日常生活;形式上混合了民歌、通俗歌曲和街头说唱,具有尖锐的政治讽刺性和社会批判性。^① 布莱希特作为实用诗的重要代表,强调创作具有“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的诗歌,重视诗歌的教育功用,并将诗歌看作启迪思考的工具和教化民众的实用文学。该主张与儒家哲学作为道德和生命哲学的务实观念存在共性。

《家庭祈祷书》是体现布氏最为看重的诗歌“使用价值”的典型代表。其一,标题中的“Postille”一词来自拉丁语“post illa verba”,是指对《圣经》的教育式评注,^②最初指的是在家庭中使用的祈祷书,有时也用作牧师在教堂朗读的讲道集或讲道书。从字面意义上讲,“Postille”是对圣经文本的解释,紧随文本之后。1544年,马丁·路德已经为基督教世界明确了这一术语的意义,即信仰者不仅可以在教堂,而且可以在家庭中修身自省。布氏模仿路德的标题,并借用基督教祈祷书的传统格式编排,取其躯壳为己所用,融入自己的诗学观对其进行离经叛道的改写,让传统的祈祷书布局服务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从而使其具有“使用价值”。^③ 布氏诗集以“阅读指南”作为序言,并从中对诗歌集的结构做了清晰的划分。整部诗集被分为五部分,即五课,每首诗歌以章/篇(Kapitel)为单位,诗歌的诗段均用数字标记,使之整体上既有宗教祈祷书的形式,又具有教科书传授知识的特点,这一结构历经多次改版依然得以保留。不仅如此,布氏还在序言中对每首诗歌给出了具体的阅读建议,提醒读者边阅读边思考,尽量“慢读细读,领悟诗歌言外之意”。^④ 布莱希特重视诗集的教育作用,将其看作一种启迪读者了解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手段,这与孔子强调文学的匡正教化作用、将文学伦理道德化的主张相呼应。在收录于《家庭祈祷书》的《结束章》(Schlußkapitel)的《抵制诱惑》(Gegen Verführung)一诗中,布氏更以连续的命令句提醒世人在面对诱骗时应保持清醒:

别受诱惑!
没有什么可以重来。
.....

^① 参见丁君君、任卫东:《新编德语文学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357-358页。

^② Jürgen Hillesheim, *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 Einführung und Analysen sämtlicher Gedichte*, S. 20.

^③ 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301-302.

^④ 同上, S. 39-40.

别受欺骗！
生命如此渺小
.....
别受敷衍！
你们已没有太多的光阴！
生命最宝贵，
它不能复生。^①

布莱希特强调珍重生命，没有什么可以从头再来，人不能死而复生，这与上文提到的同样出自该诗集的诗歌《死兵传奇》中对爱国谎言的揭露讽刺相呼应。整首诗歌“莫上当、莫受骗、多思考”的宗旨同样与诗集序言相符，可见诗人拒绝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而看重诗歌的教育功能，将诗歌看作可以教化民众的实用文学，并借助这种“直接说教”的手法，艺术地再现某些革命道理，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时代背景下的形势和事件。与《家庭祈祷书》类似，孔子编订的《诗经》不仅是一部诗歌作品集，更是一部儒家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因为孔子竭力主张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等最高道德准则渗透到其中的文学作品中去，以此充分发挥文学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的教育作用：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②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③

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感情，可以洞悉人的内心，可以促进人的团结，可以使读者学得讽刺的方法。这是孔子“兴观群怨”诗教观念的核心思想，这四个字是孔子对《诗经》的社会和心理作用的高度概括。不难想象，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以及相似的社会责任感和文艺观点让布莱希特在精神世界与孔子相遇时更容易产生共鸣。

其二，《家庭祈祷书》的多次改版也体现出诗人对其使用价值的重视。这部诗集经多次修改直到1927年才得以问世，这与诗人担忧其初稿缺乏使用价值有关。初稿版本据说最晚于1921年就已完成，本应以民谣集(Balladenbuch)的形式于次年出版，但实际公开出版的时间却在几年之后。除去布氏20年代初以戏剧为创作重心无暇兼顾诗歌以及长期合作的基彭豪尔出版社(Der Gustav Kiepenheuer Verlag)遭遇经济问题等因素，其主要原因是布氏对诗集的早期版本不满意，认为

① 参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第73页，作者有删改。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3页。

③ 同上，第208页。

其有限的“使用价值”无法拥有长久的社会效应。^①为增加其“使用价值”，布氏对诗集反复修改，还为诗歌配乐以助其快速传播。^②最终，历经多次完善的《家庭祈祷书》不负所望，一经发表即在德国引起轰动性效应，出版多年来依然经久不衰，成为真正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

布莱希特与儒家哲学务实观念的相似性促使布氏中后期潜心审视和品评孔子学说，他对孔子思想的浓厚兴趣和批判性接受可以在其流亡时期作品中得到集中反映，这种深刻理解并非在短期内形成，而是建立在其20年代的作品立意和与孔子文艺使用观相似的基础之上。

五、灵活的树干：守柔曰强的辩证智慧

在中国先秦诸子中，布莱希特最为关注老庄，^③但布莱希特文学创作对老庄思想的接纳和运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布氏与道家思想之间最为突出的亲缘性之上，并呈现出不断深化和持续的特点。

20世纪初，欧洲再现译介中国古典哲学的热潮，一系列中国哲学典籍译著的出版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回归自然的呼吁和对理性的质疑促成了老庄思想受到热捧的际遇。20世纪20年代，“老子热”在德国学者中达到顶峰，^④卫礼贤的中国哲学系列译丛^⑤中就包含了堪称德译《道德经》中“最经典”的德译本(*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⑥自称“道家门徒”的克拉邦德^⑦(Klabund, 原名 Alfred Henschke)在其1919年出版的诗集《三声》(*Dreiklang*)中更是赋予道家创始人老子极高的救世主地位。^⑧在此背景下，1920年，当友人弗兰克·华绍尔(Frank Warschauer)向布莱希特推荐老子的《道德经》时，布氏在日记中明确表达了初次阅读老子著作后自己与老子之间惊人相似的亲缘性：“这位老子与我如此契合”(der stimmt mit mir so sehr überein)，以至于他的朋友华绍尔对此惊诧不已。^⑨

① Vgl. Bertolt Brecht, *Über Lyrik*,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8, S. 119.

② Vgl. Jürgen Hillesheim, *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 Einführung und Analysen sämtlicher Gedichte*, S. 15.

③ 参见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页。

④ Heinrich Detering,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S. 32.

⑤ 同上，S. 25.

⑥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为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出版了《论语》(1910)、《老子》(1911)、《列子》(1911)、《庄子》(1912)、《孟子》(1916)等一系列中国哲学经典，并将其汇编成题为《中国的宗教和哲学》(*Die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Chinas*)的十卷本丛书。

⑦ 诗人阿尔弗雷德·亨施克(Alfred Henschke)是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笔名克拉邦德(Klabund)，该笔名来自“Klabautermann”(海怪)和“Vagabund”(流浪汉)两个词的组合。

⑧ 同注④，S. 34.

⑨ Bertolt Brecht, *Tagebücher 1920—192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5, S. 66.

此后几年，布氏作品中不时化用道家思想：如早期作品《在城市丛林中》(*Im Dickicht der Städte*)通过主人公一句“书本上写的我读过，柔弱之水能将一整座大山卷走”^①所呈现的老子思想的印记；1925年，布氏发表在《柏林交易所快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上的《礼貌的中国人》(*Die höflichen Chinesen*)一文更直接以老子《道德经》成书故事为主题。然而，值得探究的是，为何布氏1920年初识《道德经》后明确表达了与老子的“不谋而合”。这种肯定的语气表明，他在阅读《道德经》之前与这位道家创始人在思想上就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思想上的亲缘性如何在他早期诗集《家庭祈祷书》中得以充分表现^②？

收录于《家庭祈祷书》第一课的诗歌《为一棵“绿”树晨祷》(*Morgendliche Rede an den Baum Green*)^③描写了一棵名为“绿”的树因懂得弯腰而幸存于风暴。这首诗歌与西方文学中树木通常的隐喻意义截然不同，而是体现了布氏“以弱胜强”的观念：

今夜是我冤枉了您；
狂风呼啸令我难以安眠。
我望向屋外，看见您摇摇晃晃。
.....
您经历了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
秃鹫也对您刮目相看。
它们已懂得您的价值。
.....
在楼宇间长高，并非易如反掌
绿，您如此挺拔，所以才招来今夜风暴。^④

正因“绿”树懂得以弯曲的姿态暂避危险，才得以凭借自身的柔软和灵活战胜前夜的风暴，并在第二天清晨依然保持高昂的姿态。青年布莱希特赞赏“绿”树的功绩，认为它具备和风暴一决高下的实力，可见此处柔弱绝非软弱，而是真正生命力的象征。这与老子“守柔曰强”的处世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① 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I, S. 478.

② 关于布莱希特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德国布莱希特研究者海因里希·德特林(Heinrich Detering)在其专著《布莱希特与老子》(*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中做了详细阐释和分析，并提及布氏与道家思想的亲缘性在布氏早期诗集《家庭祈祷书》中的体现，但未做详细文本解读。Vgl. Heinrich Detering,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S. 36.

③ 布莱希特采用了英语表达 Green, 1956年他根据德语发音修改为“Griehn”。Vgl.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305.

④ 参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第43页，作者有删改。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43章）^①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76章）^②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德经》第78章）^③

道家的“贵柔”思想在《道德经》中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论证过程，从“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发展到“至柔驰骋至坚”，并以水为范例，充分体现了“柔能克刚”这条亘古不变的自然界法则。流动的水看似柔弱却拥有无法征服的强大力量，随时间推移甚至能击溃顽石，这是道家思想中有关流水意象的核心比喻，其中体现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的典型特征。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并非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更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大智慧。布氏以柔树代替流水，其应对危机的方式恰好与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契合：

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3章）^④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37章）^⑤

布氏在1956年对此诗进行改编时，通过诗句“只有凭借您坚定不移地退让(Nachgiebigkeit)/您才能在今早依旧挺立”，^⑥更加明确地阐释了诗歌“守柔曰强”的主旨。不仅如此，树木逐渐成为布氏诗歌中颇具代表性的意象之一。在布氏的后期诗歌《铁》(Eisen)中，诗人以风暴中铁支架的“坚而毁灭”(Den Eisernen, abwärts)反衬木支架的“曲而幸存”(Bog sich und blieb)，^⑦在20年代版本的基础上，“以弱胜强”的观念与道家精神得到了进一步融合。

此外，《家庭祈祷书》中也有直接提及道家流水意象的诗歌。《被淹死的女孩》(Vom ertrunkenen Mädchen)一诗创作于1919年，源自戏剧《巴尔》(Baal)。剧中一位神职人员称赞主人公巴尔的灵魂“就像水一样，能够接受任何形态，并填满任何形状”。^⑧这一比喻绝非信手拈来，而是指久居湖边的巴尔将世界的本质理解为

① 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② 同上，第133页。

③ 同上，第137页。

④ 同上，第5页。

⑤ 同上，第62页。

⑥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 S. 306, 作者译。

⑦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XII, Werner Hecht/Jan Knopf u. a.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 315.

⑧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in 30 Bänden*, Band I, S. 55.

水一般的奔流,世间一切都融入这生与死的洪流之中,“自我”也同样汇入其中。^①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为老子《道德经》一书中最核心的概念,全书正是以对“道”的探讨为逻辑起点展开其关于宇宙与人生问题的全部论述的。^②老子将“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又将“道”比作“水”,说明“水”同样具有世界本源的特性,这与布莱希特戏剧《巴尔》中对水这一意象的理解不谋而合。同时,布氏在此处也赋予了“水”积极的内涵,体现了其包容性和流动性的特点。这与道家思想中水的谦下、包容万物之道不谋而合:“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第66章)^③

与戏剧相似,《被淹死的女孩》一诗作为巴尔为在河边溺亡少女所唱之歌,诗歌结尾段落中女孩的身体在“流水之中”(in Flüssen)消融于世界的体验映射的正是超越自我融入大自然的场景,这样的描述与那一代自称“道家人”^④的德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对道家思想中水的特性的理解存在共通之处。^⑤布莱希特早期诗歌中的流水意象以及消融于自然的思想与道家哲学之间的亲缘性已不言而喻。

在1920年正式接触老子思想之前,布氏早期诗集《家庭祈祷书》中展现的对战争的厌恶、人道主义的共情观念同样呈现出与老子观点的相似性,可见布氏早期思想中就已包含与道家思想相结合的元素。事实上,老子在布莱希特的中国情节中占有特殊地位,道家思想在布氏创作中并非偶或齿及的点缀,而是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体现。有别于布氏与儒家、墨家思想之间的关系,他与道家哲学传统的联系都是自发的。^⑥因此,当青年布莱希特初识《道德经》时,才会由衷地发出“不谋而合”的感慨,这种思想层面的契合促使他对老子哲学产生持续浓厚兴趣,相互之间的亲缘性成为布氏接下来一生孜孜不倦接受道家文化启迪、灵活运用和化用“贵柔”思想及流水意象开展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

六、结 语

20世纪初,德国学者通过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寻找精神认同,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克拉邦德等作家致力于对李白诗歌的翻译改写,引发了世纪之交德

① Vgl. Heinrich Detering,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S. 36.

② 参见江向东:《“道”、“自然”与“反”——老子〈道德经〉新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26-31页,这里第27页。

③ 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译》,第117-118页。

④ Vgl. Xue Song, *Poetische Philosophie — philosophische Poetik. Die Kontinuität von Philosophie und Poesie in Brechts China-Rezeption*, S. 23.

⑤ Vgl. Heinrich Detering,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S. 36-37.

⑥ Antony Tatlow, *The Mask of Evil. Brecht's Response to the Poetry, Theatre and Thought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Bern: Peter Lang Verlag, 1977, p. 364.

国文坛的“李白热”风潮。卫礼贤翻译的一系列中国哲学典籍则建构出中国古典智慧所蕴含的现代普世人文价值。其中，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主张也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疗愈精神缺失、缓解文明危机的重要方式。这种对异域文化的化用和创造性变异不仅在实质上成为了西方感知、认同中国美学精神的重要渠道，^①更是接受方在外来文化上对于自身文明反思的投射。我们有理由认为，20世纪初的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接触中国文化之初就已具备与其相似的同质性，正如陈思和所强调的“世界文学的同步态”和“精神现象的相通”。^②作为20世纪德语经典作家，布莱希特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致力于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这种积极的学习态度缘于其个人早期文学创作在主题、宗旨和语言风格等多个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认识。

本文聚焦于布莱希特早期诗歌集《家庭祈祷书》与中国诗人白居易和中国先秦诸子哲学思想之间暗藏的亲缘性，通过对其中六首诗歌《死兵传奇》《声息颂歌》《关于杀婴犯玛丽·法拉尔》《抵制诱惑》《为一棵“绿”树晨祷》和《被淹死的女孩》进行富有启发性的重新审读，发现其早期诗歌在主题宗旨以及语言风格上与中国文化存在明显的不谋而合之处。无论是中国古代诗人的文学创作，还是先秦诸子的思想结晶，都在布莱希特早期诗歌中有所体现。布莱希特对文学主题的选择，对反战、“贵柔”等思想的重视，其诗歌在政治教化方面的运用，以及对道德和环境相关性的认识，都与他后来对中国哲学家孔子、老子、孟子以及诗人白居易的浓厚兴趣相契合。在创作手法和语言风格方面，他对反讽夸张的技巧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的运用，也与这些文化传统有着共通之处。虽然布氏之后阅读并接受了中国文学和哲学经典，但在其早期文学创作中仍可见到与中国文化相似的倾向、观点和表达。这种思想上的同质性为布莱希特之后终其一生在文学创作中大胆借鉴、灵活移植以及创造性改写中国元素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因此有了与中国文化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前提。布氏在打开“他者”文化的同时也以此来丰富、补充或修正自己的文学创作。显然，布氏流亡时期和后期对中国文化与艺术呈现出的浓厚兴趣和创造性接受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基于其早期文学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他在中国这个文化“他者”身上看到的与自己相似的诗学取向和美学革新得到了验证，一如1920年他本人初识《道德经》后发出不言自明的由衷感叹那样：这位老子“与我契合”得令人震惊。这种“不约而同”恰恰是他能够迅速为中国着迷并成为对中国文化最具构建性和创造性作家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朱苗苗

^① 参见李双志：《德国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的现代重构——以“诗歌中国”的发现和译介为例》，第105页。

^② 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因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